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战略策略及其现实启示*

朱思远

【内容提要】 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成功领导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光辉典范。二月革命爆发后，列宁及时提出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战略任务，为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列宁遵循“多数人革命”的策略原则，准确分析阶级力量对比，耐心等待和积极促进群众觉悟水平的提高，并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赢得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最终在革命时机成熟之际果断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研究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战略策略，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战略策略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战略策略的重要意义，科学掌握制定战略策略的原则和方法，正确运用战略策略解决实际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战略策略 十月革命 列宁 布尔什维克党

作者简介：朱思远（1995-），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①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就深刻印证了这一点，他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战略策略，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对此，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宣布要实行那种唯一能挽救民主制和将革命向前推进的策略，并且坚定顽强地把这一策略贯彻到底……列宁的党是俄国唯一在那最初时期就理解革命的真正利益的党，它是革命的向前推进的因素，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它是唯一真正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党”^②。正是在列宁正确的战略策略的指导下，布尔什维克由一开始在俄国政治舞台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派，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了国内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将工人、农民、士兵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下，并团结了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一跃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成为形势的主宰。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充分彰显了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高瞻远瞩的战略远见和炉火纯青的策略艺术。

一、指明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战略方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长时间的战争拖垮了俄国，失业、饥饿、死亡的威胁将俄国劳动人民推向绝望的边缘，这加速了沙皇专制统治走向崩溃的步伐，革命形势在持续酝酿中日益成熟。1917年3月，俄国人民进行了二月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统治俄国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两个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研究”（23ZDA006）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82页。

②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

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垮台了。二月革命的爆发，使俄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动，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这既使俄国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考验，也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两个政权的并存代表着两股政治力量的势均力敌，原因是俄国无产阶级还不够觉悟，而俄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够强大，统治经验还不够丰富。但这一过渡时期只能是短暂的，这种平衡终将被打破。此时，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策略将决定革命的前途命运，如果战略策略得当，俄国无产阶级就能抓住这次有利时机，将革命向前推进，促成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如果战略策略失误，俄国资产阶级建立并将巩固住自己的统治，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会拖延，而下一次革命的时机是难以预料的。

二月革命爆发时，列宁还在国外，他撰写了多篇文章，全面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必须坚持的战略策略原则，提出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这仅仅是革命的第一阶段，布尔什维克应当揭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本质，争取工农群众的支持，将革命推向第二阶段，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在一份提纲草稿中明确提出：“因此，革命无产阶级不能不把3月1日（14日）的革命看做它在自己的伟大道路上取得的初步的但还远不是完全的胜利，不能不给自己提出继续为争取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任务。”^①他为《真理报》撰写了以《远方来信》为总标题的一组文章，深刻分析了二月革命后的政治形势，准确估量了各阶级和党派对革命的态度及其力量对比，详细说明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系列策略主张和革命的步骤，“这些步骤就其整体和发展来看，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②。

1917年4月，列宁结束长期的国外流亡生活回到俄国，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四月提纲》明确了俄国的形势特点是由民主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③，并以简明扼要的方式回答了党在当时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提出了“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不要议会制共和国”“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④等一系列具体的策略方针，为俄国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正确政治路线。

《四月提纲》发表后立即引发了巨大的分歧和争议，加米涅夫、普列汉诺夫等人认为，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生产力也过于落后，根本不具备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条件；李可夫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在欧洲最落后的俄国率先爆发，应当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托洛茨基则坚持革命只能在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⑤。列宁反对用旧的资产阶级革命范畴来理解和限制革命的新阶段，他强调，从政权转移的角度来看，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了，而且在战争造成的人民群众处境极端困难的特殊形势下，革命也应当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狭隘框架，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和饥饿，就免不了还会有千千万万人的死亡”^⑥。正如列宁后来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的：“面对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难道他们就不能奋起斗争，以求至少获得某种机会去为自己争得进一步发展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6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4页。

③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4页。

④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4-116页。

⑤ 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编：《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4-675页。

⑥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0页。

文明的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吗？”^①而且，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四月提纲》所标志的革命新阶段兼具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是介于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阶段^②。对于这种不纯粹性，列宁指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而且在战争期间也不可能向纯粹社会主义过渡的纯粹资本主义，只有某种中间的、某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因为卷入资本家之间的罪恶战争的几亿人正面临着死亡。”^③列宁提出的很多政策主张正是以摆脱战争造成的恶果为直接目的，因此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支持。

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绝不能用理论来裁剪现实，“把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放在狭隘理解的‘理论’的普罗克鲁斯提斯床上”^④。列宁认为，批评《四月提纲》的人犯了教条主义错误，他们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抽象地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⑤。然而，当革命已经提上日程的时候，人们最需要的是前进的方向、坚定的信念、灵活的策略和果断的行动，而不是纠缠于理论的是非。《四月提纲》并没有要求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⑥的战略任务，指明了俄国革命前进的总方向，这就是《四月提纲》最重要的意义。正如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弗·普拉滕所言：“列宁的力量在于他能异常明确地看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坚定不移地促进必然的历史进程的发展，一贯对工人群众的革命创造性充满信心，为之欢欣鼓舞。”^⑦

二、坚持争取大多数群众支持的策略原则

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曾指出，“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只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⑧，而无产阶级革命是多数人的革命，没有多数人的觉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在领导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列宁始终按照“多数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原则，一步步地推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⑨。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政权，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列宁能够准确分析阶级力量对比，耐心争取大多数群众的支持。这一点既可以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和布朗基主义的策略的本质区别，也能够有力驳斥所谓的“十月革命早产论”。

二月革命后，由于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还不够觉悟，他们受到“革命护国主义”的影响和资产阶级许下的空洞诺言的欺骗，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抱有幻想，竟自愿把夺来的国家政权交出去，而且当时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也处于少数地位。列宁在科学分析客观形势的基础上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了正确的策略。一方面，他充分估计到了广大群众的觉悟水平，指出“他们受到传统和欺骗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5页。

② 参见曹浩瀚：《列宁革命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97页。

③ 《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0页。

④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⑤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⑥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8、54、357页。

⑦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列宁画传（列宁诞辰150周年纪念版）》，重庆：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13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8-539页。

⑨ 参见余斌：《为什么是十月革命而不是七月革命？——驳考茨基的社会主义“早产论”》，《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的影响，他们还没有政治经验”，“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资本家的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①，并准确分析了当时俄国政治舞台上各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现在是少数，群众还不信任我们。”^②因此，在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动面目、布尔什维克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情况下，夺取政权的时机还远远没有成熟。列宁强调：“假如我们在人们还没有了解到内战的必要性时就提出内战，那我们一定会陷入布朗基主义。”他还指出，只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还没有使用暴力，党的任务就只能是“和平的、长期的、耐心的阶级宣传”，因为“只有人民知道谁是使用暴力的人，才能起来把他推翻”^③。无产阶级政党只主张在大多数群众具备阶级觉悟的情况下发动革命。在对群众的觉悟程度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判断上，容不得一点主观主义，把党的策略建立在主观愿望的基础之上，把自己的愿望当作客观现实，“这对革命家是最危险的错误”^④。

另一方面，列宁始终相信人民群众，大力推崇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认为人民群众能够在解放事业中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列宁指出：“在世界上，不论哪个地方哪个时候，群众要摆脱压迫和专横获得真正解放，无不是这些群众自己进行独立、英勇、自觉斗争的结果。”^⑤列宁强调，布尔什维克党绝不能急躁冒进，绝不能超出群众的觉悟程度将革命强行推进，而是“要善于等待”。列宁坚信：“一旦政府显露出本来面目，群众就会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政府的摇摆不定将使它失掉群众，群众一定会涌到我们这一边来，那时，我们就会根据力量的对比宣布：我们的时候到了。”^⑥因此，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在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的极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党的工作时必须善于适应这种特殊条件”^⑦，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和经验出发，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正确主张，揭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谎言，帮助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列宁强调：“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⑧只有准确分析各阶级的力量对比，耐心地在群众中做工作，才有可能使胜利的天平逐渐倾向自己。在列宁的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在群众中展开了细致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逐步转到了布尔什维克党方面。

群众政治觉悟的提高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障，而在这方面绝不能采取强迫的方法，“只能是并且应当是用同志的态度在思想上进行说服，指出实际生活的经验等”^⑨。列宁认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的‘说明’工作”^⑩，使他们能早日认清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真实面目。不是少数人靠着密谋夺取政权，而是“真正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扬群众在地方上大胆坚决的首创精神，促使他们自动地去实现、发展并巩固自由、民主和全部土地归全民所有的原则”^⑪。七月流血事件后，“生活教导群众认识了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策略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5页。

③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9页。

④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⑤ 《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3页。

⑥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5页。

⑦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4页。

⑧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5页。

⑨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6页。

⑩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3页。

⑪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6页。

的正确性”^①。正是在群众的政治经验、觉悟水平大大提高，布尔什维克党赢得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的情况下，列宁才制定了举行武装起义的策略方针，从而一举夺取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列宁认为，“决不超过群众的发展程度”是“革命的发展绝对必需做的事情”^②，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揠苗助长，必须耐心地等待群众从自己亲身的斗争经验中觉悟和成长起来。

三、善于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一个著名口号，它经历了一个提出、收回和再次提出的过程。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而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着武装力量，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掌握政权，是因为得到苏维埃的支持，“如果没有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苏维埃的同意，这些部长一天也当不下去”^③。因此，尽管政治形势持续动荡，但社会总体上仍然保持着和平的局面，“没有人使用暴力”“没有用暴力压迫群众的现象”^④。在这种情况下，列宁认为，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布尔什维克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合法性，努力争取在苏维埃中赢得多数，以和平的方式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因此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⑤的策略口号。

但局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转折，执意参战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前线不断溃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引发了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临时政府对此进行了暴力镇压。“7月4日，参加示威的40万群众中有50余人被打死，近650人受伤。临时政府大规模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列宁被诬为‘德国间谍’而遭到通缉。”^⑥七月流血事件之后，两个政权共存的局面宣告结束，布尔什维克党被迫转入地下，小资产阶级完全倒向资产阶级一方，革命的和平发展已无可能，接下来只能采取暴力方式夺取政权。此时，苏维埃已经成为临时政府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坚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就是仍对革命的和平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阻碍革命的发展进程。因此，列宁收回了这个口号，明确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发动群众，积极地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1917年9月爆发的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事变使临时政府在人民群众中丧失了威信，也失去了军队的支持，而布尔什维克则积极号召和组织广大工人和士兵奋起反抗，最终粉碎了叛乱。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掌握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并且在全国大多数苏维埃中取得了多数，苏维埃因此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如果出现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和平夺取政权的机会，无产阶级但愿如此，是不会加以反对的”^⑦。因此，列宁再次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为“在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的条件下，革命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可能的”^⑧。布尔什维克一向尊重群众对于和平的渴望，尽量避免流血牺牲，始终不放弃任何一种使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49、114页。

⑤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22页。

⑥ 陈之骅：《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1917年俄国革命——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0周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8期。

⑦ 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十月革命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66页。

⑧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5页。

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列宁在《革命的任务》中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人们尽一切可能不放过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那么……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最尖锐的国内战争……但是如果苏维埃抓住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那么无产阶级一定会全力支持苏维埃”^①。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求考虑客观条件及其变化；应当根据这些条件具体地提出问题”^②，“每一个口号都应当以一定政治形势的全部特点为依据”^③。客观形势的变化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迅速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在七月流血事件之前，即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正确的；而七月流血事件后，资产阶级实际上攫取了国家政权，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已背叛了革命，他们操纵的苏维埃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因此“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已不适用，必须收回；9月粉碎科尔尼洛夫叛乱之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全国大多数苏维埃，革命再次呈现出和平发展的可能，同时为了让群众彻底认清资产阶级的面目，列宁再次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旨在建立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专政的‘策略路线’”^④。从“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口号的提出、收回和再提出中，列宁为我们上了“善于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策略”的生动一课，“显示了布尔什维克策略的高度灵活性”^⑤。

列宁在《论口号》中对此进行过深刻的总结，他指出：“在历史急剧转变的关头，往往连先进的政党也会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种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今天却已经失去任何意义，而且失去得如此‘突然’，就像历史的急剧转变来得如此‘突然’一样”^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学会“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最主要的东西”^⑦，在制定策略时，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强调：“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⑧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就是因为用旧模式套新形势，不能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科学分析帝国主义战争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新情况，从而走向了布尔什维克的对立面。“善于根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来研究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分析新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列宁主义的特点。”^⑨

四、在革命时机成熟之际果断采取行动

二月革命后，列宁并没有立即提出“打倒临时政府”的口号，“因为在革命无产阶级还没有掌握可靠的（即有觉悟的和有组织的）人民大多数的时候，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讲空话，或者在客观上是一种冒险行动”^⑩。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迟迟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于“和平、面包和自由”^⑪的迫切要求，执意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渐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七月流血事件后，列宁就断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9、157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0页。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④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6页。

⑤ 周尚文：《列宁政治遗产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3页。

⑥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页。

⑦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8页。

⑧ 《列宁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9页。

⑨ [苏]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学习列宁的工作方法》，李晓萌译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2年，第17页。

⑩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9-320页。

⑪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定“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①，从而制定了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为十月革命做了最充分的策略准备。同时，鉴于当时的形势，列宁也提醒全党，目前还不能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必须继续争取群众、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为党和无产阶级指明了行动方向。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后，“俄国经历着由战争所引起的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农业破产、工业凋零、交通紊乱，全部经济生活处于崩溃状态，广大人民群众备受饥饿、穷困和失业的痛苦”^②。广大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彻底破产了，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到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反动以及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苏维埃日益布尔什维克化，不仅工人阶级，而且农民和军队也转向支持布尔什维克，蕴藏在群众中的革命首创精神正在以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迸发出来，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重大转变。列宁指出：“现在阶级的大多数，即能够带动群众的革命先锋队、人民先锋队的大多数已经跟我们走了。”^③ 布尔什维克的实力大大增强，七月流血事件前后，党员队伍就由二月革命初的2.4万人扩大到24万人，而科尔尼洛夫叛乱平定后，党员数量激增至35万^④。

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继续奉行妥协的策略，他们通过召开全俄民主会议，企图用资产阶级宪政的道路取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道路，这使革命和平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也丧失殆尽。列宁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俄国无产阶级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革命时机，立即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绝不能有丝毫犹豫和动摇。他强调：“放过了时机，那就是犯了滔天的大罪。”“现在拖延起义确实等于自取灭亡。”^⑤ 1917年11月，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首都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举行了武装起义，迅速占领了许多战略据点，他们以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为信号，夜晚攻入冬宫，逮捕了临时政府成员。7日晚，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大会宣布临时政府被推翻，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权转归苏维埃，成立了以列宁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告诞生。

列宁判断革命时机是否成熟的根本依据就在于群众的觉悟水平及其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程度。7月爆发的群众性示威游行本来有发展成为推翻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的趋势，但列宁却不赞成这样做，即使在七月流血事件发生后，在布尔什维克被迫转入地下的情况下，只要大多数群众还没有彻底放弃对临时政府的幻想，列宁就坚持认为革命的时机还不够成熟。科尔尼洛夫叛乱的爆发“异常有效地使人民群众看清楚了过去和现在一直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用妥协词句掩盖起来的真相”，“向俄国证明了整个历史向各国证明了的事实：资产阶级只要能保住自己对人民的统治和自己的收入，就会出卖祖国和干出一切罪恶的勾当”^⑥。这使广大群众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彻底破产，他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自觉地转为支持布尔什维克，只有在这时，列宁才指出革命的时机成熟了，大多数群众的觉悟及其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

短短8个月的时间，俄国经历了两场革命风暴，各阶级及其政党在俄国政治舞台上斗争不断，但布尔什维克却能由最初的弱者成长为最后的赢家，夺取政权、创造历史，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深刻危机，大大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力量，并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各帝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页。

② 孙成木、李显荣、康春林：《十月革命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9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7页。

④ 参见陈之骅：《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的1917年俄国革命——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00周年》，《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7年第8期。

⑤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1、430页。

⑥ 《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4页。

国主义列强也由于忙于战争无暇顾及俄国局势的变化；二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上十分成熟，战略策略极为高明，逐渐赢得了大多数群众的支持，最终在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战略策略是共产党人必须学习和掌握的一门科学，正如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人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我们的策略手法和战略手法仍然比资产阶级卓越的战略稍逊一筹（就国际范围来说）……我们正在学习策略和战略……在掌握这门‘科学’方面有了长进。我们必将完全攻下这门‘科学’。”^①

五、现实启示

回顾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策略至关重要，它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曾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②。刘少奇也指出：“如果不懂得战略和策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者。”^③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成功领导是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光辉典范，其中蕴含着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卓越智慧，我们应当从中汲取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正如列宁在研究马克思的策略时指出的：“我们决不当抛弃马克思的策略范例——否则就是口头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同马克思主义决裂——而应当从对它们的具体分析中吸取对未来极为宝贵的教训。”^④

第一，战略决定方向，要培养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⑤战略决定方向，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一旦战略上发生错误，就会满盘皆输。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指出：“战略就是规定无产阶级在革命某一阶段上的主要的打击方向，制定革命力量（主要的和次要的后备军）的相应的布置计划，在革命这一阶段的整个过程中为实现这个计划而斗争。”^⑥二月革命后的历史转折关头，列宁在《四月提纲》中高瞻远瞩的战略谋划对于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意义如同拨云见日，不仅明晰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而且明确了革命的前进方向，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根本前提。

“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⑦战略思维要求我们思考问题要有规律性、系统性和前瞻性。所谓规律性，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即抓根本；所谓系统性，就是将局部置于整体之中，即谋全局；所谓前瞻性，就是预见事物的发展趋势，即观大势。二月革命后，由于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奇特现象，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仅从表象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⑧。列宁则透过纷繁复杂的政治局势，从政权转移的规律的角度，揭示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任务已经完成，从而抓住了根本和全局。在此基础上，列宁还批评了他们缺乏预见性的错误，“到了1917年，还只看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过去。而实际上，这个专政的未来已经开始”^⑨。列宁很早就预见到革命的未来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从而把握住了历史发展大势，这充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3-11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3页。

③ 《刘少奇年谱（增订本）》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39页。

④ 《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⑥ 《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46-247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页。

⑧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4页。

⑨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6页。

分彰显了列宁的远见卓识。

第二，策略决定方法，要掌握策略艺术，善于将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策略方法，讲求斗争艺术。”^①如果说战略解决的是指方向的问题，那么策略解决的就是找方法的问题。“正确的战略需要正确的策略来落实。策略是在战略指导下为战略服务的。”^②列宁在明确了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战略目标和根本方向后，还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策略方法来实现这一战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遵循“多数人革命”的原则，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和经验出发，运用他们能够接受的一切斗争方法，把他们引向革命^③，并根据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策略，最终在时机成熟之际果断行动。如果没有这些正确的策略方法，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赢得大多数群众的支持，也就难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战略和策略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④共产党人要兼具战略定力和策略活力。在战略和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在策略和方法问题上灵活机动，这是列宁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一个显著风格。十月革命前后，面对党内外众多敌人的非议和反对，列宁从未动摇过他的革命信念，始终坚持在客观条件允许的限度内，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尽可能地历史推向前进。没有这种战略定力和政治远见，即使是伟大的人物，也难免会在敌人轮番的攻击下自我怀疑和摇摆不定，这样就会错失发展机遇。而灵活机动的策略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它不仅使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也帮助布尔什维克巩固了政权，列宁认为这是革命所必需的一种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⑤

第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是制定战略策略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⑥。战略策略要转化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就必须付诸实践，这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战略策略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那么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科学的战略策略就不能得到运用。正如列宁指出的：“没有一个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时期都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坚强的组织，就谈不到什么系统的、具有坚定原则的和坚持不懈地执行的行动计划，而只有这样的计划才配称为策略。”^⑦斯大林认为，党的领导是“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准备时期的策略的第一个特点”^⑧。没有这个特点，俄国无产阶级就难以抓住革命的时机，难以采取果断的行动，十月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在制定战略策略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始终“着眼于我们党执政地位巩固和增强，着眼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⑨。

此外，没有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战略策略也无法发挥作用。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注重客观事实，注重群众和阶级，而不是注重个别人物等等，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实际情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22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页。

③ 参见刘志明：《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思想及其当代意义》，《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5期。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1页。

⑤ 《列宁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⑦ 《列宁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⑧ 《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95页。

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84、86页。

况的特点必然造成当前策略的特点。”^① 共产党的战略策略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战略策略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以唯物史观，特别是群众史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它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和争取群众的广泛支持为目的，因而这种战略策略是敌人所不能运用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正是通过耐心争取大多数群众的支持才实现了阶级力量对比的最终扭转，从而“解决了关于‘人民的多数’那个著名问题，这个问题从来就像梦魇一样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胸口”^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③。因此，在制定战略策略时，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原则，任何时候都要顺民意、得民心，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我们才能把握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只有按历史规律办事，我们才能无往而不胜”^④。

参考文献：

- [1] 俞敏：《列宁十月革命战略思想及进程中的重要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
- [2] 刘志明：《列宁思想和著作研读札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
- [3] 王伟光：《中国共产党人是列宁主义最忠实的捍卫者、传承者和创新者——纪念列宁逝世100周年》，《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3期。

（编辑：张 剑）

（上接第102页）改变和“自我”改变之间的动态生成关系中，为无产阶级奠定行动自觉和意识觉醒的双重主体性基础。只有以“革命的实践”理解“人的环境”与人的关系，才能够超越以往“一切唯物主义”必然遭遇的乌托邦陷阱，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中开启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性可能。

新唯物主义思想作为内在通往共产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提供了实现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与根本方法。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比，《提纲》中“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只是从原则高度进行提纲挈领的哲学式刻画，尚未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形态中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性本质，但也不应忽视《提纲》中“实践”的新唯物主义自身的超越性意蕴。依循对“革命的实践”论断的层层追问，《提纲》中新唯物主义的社会性主线、自然性底色和主体性向度，内蕴社会史、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历史性思维，构成马克思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点。廓清“革命的实践”论断的本真内涵，有利于领会马克思早期唯物主义思想的内在演进逻辑，揭示“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力求“改变世界”的革命理想。

参考文献：

- [1] 孙正聿：《哲学通论》（第3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
- [2] 张盾：《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 [3] 王岩：《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正义的实践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4期。

（编辑：刘曙辉）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5-156页。
② 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4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09页。
④ 习近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求是》2024年第7期。